

8月10日,本报报道了在“两弹结合”试验中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地下控制室里的“阵地七勇士”。近日,“阵地七勇士”之一的佟连捷主动联系记者,建议记者去采访一下已去世多年、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的高震亚的家人。

“高政委是我们7个人中级别最高的……本来名单中没有他,可他觉得自己是领导要以身作则,主动要求

到地下控制室……我们几个都拿了三等功,就他没立功。”电话里,佟连捷强调了寥寥三点,但一位英雄口中的英雄已经跃然纸上。

直到和高震亚的家人当面细数他的一生,记者发现,当年在地下控制室里经历的生死考验,一直被高震亚视为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被他视为一名革命军人的“理所当然”。



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

——访“两弹结合”试验“阵地七勇士”之一高震亚的家人

■本报记者 杨明月

致敬·心中英雄

最爱听女儿吟唱的儿歌

“为了咱们国家什么都不怕,勇敢把敌杀”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高震亚”三个字,会发现这位为了国防科研和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革命家,并没有在身后留下什么记录。只有加上“阵地七勇士”一起搜索时,才能在一些报道“两弹结合”试验的文章中瞥见他的名字。

不留痕迹就是高震亚想要留下的“身后名”。他的家人告诉记者,在高震亚退休后,他们多次劝他写回忆录,或由人代书,都被他坚决拒绝。

许多故事因此湮灭,无人知晓。2002年,原国防科工委干部学校副校长高震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追悼会上,他的同事念读的一段生平让家人听得“心惊肉跳”：“他英勇坚强,身先士卒,机智勇敢,先后参加了攻打叶县、孙祖等30多次战斗,尤其是在1943年的滨海区战斗中,他率领特务连与日本士官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指挥得当,勇猛顽强,取得了战斗胜利,受到军区首长的嘉奖,为抗日战争作出积极贡献。”

家人们对这惊讶不已。他们所认识的高震亚,是一位为部队培养大批人才的教育家,是为了“两弹一星”事业呕心沥血的科研工作者,然而这段和日本鬼子拼刺刀的经历,连和他在山东抗日

军政大学相识、携手走过半生的老伴赵莹琦也未曾听闻。

高震亚去世后,有一次二女儿高琦听到大姐高祝捷唱起一首儿歌,勾起了她的童年回忆,两人一起合唱起来：“我的爸爸是个好爸爸,为了咱们国家什么都不怕,勇敢把敌杀……”

高琦回忆,他们小时候父亲工作特别忙,偶尔回家早一点,就喜欢把孩子召集到一起给他表演节目,这首儿歌高震亚最爱听,一直是他们的固定表演曲目。

也许那时候,听着孩子们唱歌的高震亚,正在心底默默回想着自己“为了咱们国家什么都不怕,勇敢把敌杀”的青春。

留给妻子的一封信“遗书”

“你自己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拉扯大”

这是一次筹划许久的出行——9月10日,高琦和丈夫专程从北京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这片戈壁滩有着独特神奇的魅力。那些在上世纪基地一穷二白时来到这里、见证过初创时期艰辛的“东风人”,离世后几乎都回到了这片土地。

“我爸这一辈子去过很多地方,唯独这里他一直牵挂着,念念不忘。”高琦说。在烈士陵园里,高震亚墓与同在地下控制室待过的几位战友王世成、顾振清、张其彬的墓离得很近。

1966年10月26日,“两弹结合”试验前一天,在外工作了几个月刚回来不

久的赵莹琦在家中“意外”看到了丈夫高震亚。匆匆一见,她甚至没留意到长年留着寸头的爱人突然成了光头——当年曾撞见高震亚剃头的“阵地七勇士”徐虹说,高震亚那时是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要“剃头明志”。

“那时不知道他要执行什么任务,我们家属得到的通知是要演习。”赵莹琦回忆,高震亚像往常一样嘱咐她说：“如果演习出现问题,你就跟着火车离开。”因为丈夫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赵莹琦并没觉得那会是一场“特殊”的演习。

10月27日当天,赵莹琦和基地的许多家属一起上了火车,但火车并未启动,他们很快又回了家。晚上,疲惫的高震亚回到家,两人没谈任何有关工作的内容,哪怕洗衣服时赵莹琦看到了高震亚衣服兜里的一封信“遗书”,也没有多想。这是同在基地工作多年的夫妻俩形成的默契。

直到2006年,“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赵莹琦才知道,原来40年前的那一天,在距离发射场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内,她的丈夫正参加着一场一旦失败就意味着牺牲的演习。

赵莹琦想起了那封早已不知去向的“遗书”,里面只有两句话：“如果我不幸牺牲,你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你自己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拉扯大。”

传承几代人的“家风”

“生活要低调,不许给组织添麻烦”

“两弹结合”试验后,“阵地七勇士”

纪念章背后的故事

9月26日,母亲在家乡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获得一枚由她离休时所在单位领导代领的,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母亲手捧纪念章热泪盈眶,嘴里连连念叨：“祖国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们老战士呀！”

2015年1月,“9·3”胜利日大阅兵组委会为父亲寄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一天,母亲兴奋地在电话里和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反反复复说着这件喜事,不断念叨着父亲在抗战时打仗英勇、立过大功的往事。她说,那是一枚自豪的、不朽的勋章。

我生长在军人之家,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哥哥嫂嫂都是军人或者转业军人,我和丈夫更是一辈子的职业军人。我的父母跟着共产党投身革命、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无私奉献的青春、朴实高尚的人品和两袖清风的品德,是我们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在共和国诞生前,妈妈是出生在富贵人家的大小姐。1949年她在南京金陵大学读大一,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抵总统府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进步青年,她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解放军,成为一名教员,跟随部队“宜将剩勇追穷寇”。同时,母亲认识了来自贫瘠的河北平原的穷苦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并深深地爱上了他。

上世纪50年代末他们结婚时,父亲把母亲带回了老家。据说,当时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贫穷的村民把舍不得吃的白面拿出来,全部挤到爷爷奶奶那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热炕上坐满了大叔大婶,孩子们扒着窗户往里看新媳妇,里里外外,水泄不通。大婶们摸着母亲的一身“列宁服”军装和黝黑闪亮的大辫子,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吧,咋会这么好看得呢?

为了照一张父母回家结婚的全家福照片,据说爷爷咬咬牙,把家里仅有的买盐的钱拿出来,从县里请来照相馆的摄影师照了相。母亲站在最后一排的左边,父亲站在最后一排的右边。母亲经常给我们看这张照片,告诉我们这是老妈妈,这是爷爷、奶奶,这是大伯、大娘等等。她说,这里才是你们的老家,是生养你们父亲的土地,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的家乡和亲人。

这么多年来,父母对家乡亲人生活上的关照一直未曾间断。父亲离休后是湖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理事,他和母亲身体力行资助老区孩子上大学。究竟资助了多少孩子,他们从没跟我们说过。

有一年我探亲回家时,家中突然来了3名“不速之客”,一位母亲带着她的一对龙凤胎儿女,拎着鸡鸭鱼肉,提着新鲜蔬菜,来找“刘爷爷”和“刘奶奶”。刚好父母不在家,我接待了3位客人。那位妇女说,他们来自大别山老区,2008年她丈夫因病离世,两个孩子上高一,家里一下子失去经济来源,孩子都面临辍学。正在这时,湖北省关工委传来消息,说有一位曾经在大别山区打游击的老八路和他的妻子提出资助两个孩子上学。两年后,两个孩子成绩优异的孩子双双考上了武汉市江汉大学,母子三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喜的是,深山沟里双胞胎兄妹双双接到入学通知书,在全县都是新闻;忧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学期的学费就是3000元,可家里除了种地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母子三人一夜未眠,默默流泪。当清晨的阳光照进破旧的草坯房时,

他们收到湖北省关工委转寄来的署名为两位老战士的来信,信中说两个孩子4年的大学学费仍由他们来资助,钱款已寄给学校,让两个孩子迅速到江汉大学报到。

这两位老战士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在和3位客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双胞胎哥哥名叫熊之,妹妹叫熊之。如今,两名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熊之在湖北省荆门市一家公司当会计,熊之在武汉市一家食品公司做销售。父母的资助,他们一辈子铭记在心。

如今,两枚纪念章都端放在父亲的遗像前。年迈的母亲走过来,笑笑;走过去,又笑笑。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也一定在笑。

祖国,在父母的心中是一种深深的依存,是血脉是羁绊;爱国,在父母的心中是一种植于心的自觉,是忧患的担当和幸福的分享;战士,在父母心中是一份永远的职业,是一份专属于军人的荣光。

切的怀念。

从即日起,本版开设“纪念章背后的故事”专栏,通过老兵及其家人、战友的讲述,以及部队各单位史馆中的记载,去回顾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见证一幕幕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敬请关注。——编者按

祖国没有忘记

两枚纪念章背后的赤子初心

■刘小波



他们收到湖北省关工委转寄来的署名为两位老战士的来信,信中说两个孩子4年的大学学费仍由他们来资助,钱款已寄给学校,让两个孩子迅速到江汉大学报到。

这两位老战士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在和3位客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双胞胎哥哥名叫熊之,妹妹叫熊之。如今,两名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熊之在湖北省荆门市一家公司当会计,熊之在武汉市一家食品公司做销售。父母的资助,他们一辈子铭记在心。

如今,两枚纪念章都端放在父亲的遗像前。年迈的母亲走过来,笑笑;走过去,又笑笑。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也一定在笑。

祖国,在父母的心中是一种深深的依存,是血脉是羁绊;爱国,在父母的心中是一种植于心的自觉,是忧患的担当和幸福的分享;战士,在父母心中是一份永远的职业,是一份专属于军人的荣光。

下图:作者父母年轻时合影。本版制图:张锐



广西玉林市为退役一等功臣隆重举行入职仪式——

建功军营 后顾无忧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梁英海 冯强

9月18日,一场市、军分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参加的特殊入职仪式,在广西玉林市烟草专卖局举行。让人意外的是,新入职的既不是高薪引进的人才,也不是一个团队,而是来自该市兴业县的一等功臣、去年年底退役的武警战士欧仔万。

2016年,欧仔万在参加处置某重大危害公共安全事件的任务中荣立一等功。喜讯传来,欧仔万成了玉林市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事迹被写入市志,编进《玉林市国防教育读本》,成为全市开展征兵宣传和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

如果说大力宣扬立功官兵的事迹,是让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氛围“看得见”,那么安置好功臣就是让尊崇军人的氛围“摸得着”。

去年8月,玉林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联合下发《关于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进一步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意见》,详细规范了现役军人立功受奖激励机制以及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先等内容,激励更多玉林籍官兵在部队建功立业,鼓励更多适龄青年从军报国。

去年底,服役满8年的欧仔万回乡安置,玉林市军地领导第一时间明确表态,他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所有符合接收条件的单位和岗位进行挑选。一番思量后,欧仔万透露出想到市烟草专卖局工作的意愿。“安置一等功臣,是责任也是荣耀!”玉林市烟草专卖局主要领导当即表态,并着手向上级申请接收。今年8月底,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批复了申请,欧仔万这名一等功臣如愿以偿。

一生荣耀,我曾八次参加国庆阅兵

■孙启华



讲述·老兵心路

1956年12月,17岁的我应征入伍,来到海军长山要塞区,成为一名岸炮兵。1957年底,参加次年国庆阅兵水兵方队的任务交给了长山要塞区。听说能见到毛主席,我们都盼着能够被选中,最终我幸运入选。要知道,当时整个岸炮连近300人中,只选中了两人。没想到,我就此和阅兵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60多年间,我以受阅官兵和受阅方队长、顾问等身份共参加了8次国庆阅兵,3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其间那些难忘的经历,成为我人生中的闪亮记忆。

阅兵,展现的是国威和军威,阅兵式上整齐划一的队列行进和严整的军容军纪,不经过千锤百炼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此,我深有体会。

1984年9月,14个受阅方队在沙

河机场进行紧张训练。顷刻间天气突变,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其他方队都进帐篷避雨,训练场上只剩下水兵方队。作为总教练和方队长,我让水兵方队继续训练,战士们浑身都湿透了,白色的军装被步伐带起的泥水溅成了土黄色。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附近拍电影,正好用镜头记录了水兵方队在雨中训练的场景。从那时起,阅兵村就传出了“水兵不怕水、穿上黄军装”的佳话。

当天训练结束后,我马上安排战士们喝姜汤,以防感冒。不是我认为“水兵不怕水”,我只是想让大家接受更多的磨砺,磨炼意志,严明纪律。之前有一年的阅兵训练,我记得那是个酷暑,训练时在场上发现很多死蝗虫,后来才知道,是训练场的路面温度太高了,从草丛里落到地上的蝗虫很多都被烫死了。可在这样“残酷”的气温下训练,没有一个官兵喊苦喊累。

早年参加阅兵训练的时候,条件还是很差的,很多战士的鞋子磨破了

去修,修了又磨破,但他们的训练从未受到影响,队伍依然是整齐划一。

阅兵训练中发生过一些趣事。那时规定训练期间不让吃凉东西,但大热天看见冰棍,大家还是馋得不行。我为了给大家鼓励,给每人买了一根冰棍,但等化成了水,再放到热水里烫一烫才让大家吃。其实他们就是喝了点糖水,尝了尝冰棍的味道,但为了保证阅兵训练顺利进行,大家对此都没有怨言。

因为多次参加阅兵训练,1999年国庆阅兵结束后,我曾荣立一等功。但我觉得自己其实没啥功劳,不过这也算是对我训练能力的一种认可。

1984年国庆阅兵训练时,上级要求方队合练,我说水兵方队的基础还没有打好,不能进行合练。后来海军首长支持了我的决定,并亲自视察,看方队训练了一星期,说这个人练兵有两下子,就是大固执。

阅兵,提振的不仅是军心士气,更是国家实力的展现和民族意志的凝聚。记得有一年国庆阅兵,一位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有个群众说：“我过去很少关注海军,也不懂军事,但看见海军方队这么精神,我就有了安全感。”我想,这就是国家举行大阅兵的意义。虽然我曾多次参加过阅兵训练,但看完国庆70周年阅兵的盛况,我依旧心潮澎湃,情绪久久不能平静。战车浩荡,战机翱翔,先进的国产武器装备威武壮观的场面让人激动不已,受阅方队整齐划一的行进和受阅官兵高亢激昂的口号也在时时搅动我的情感,叩击着我的心扉。那一刻,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更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

(整理:宗欢欢,照片由作者提供)